



异族通婚与文化接触的非零和取向

——鄂伦春族个案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3-0073-09

●何 群

[摘要] 异族通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之间的互动,并常常由结婚对象个体之间的关系,引入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异族通婚的频率和比例,离不开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底色。因此,异族通婚成为洞察民族关系和文化接触状况的有效视角,也是测度和判断社会和谐水平,展望民族关系未来远景的重要指标。本文在尽可能利用其他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历史以来鄂伦春族异族通婚线索,侧重当代,主要凭借作者在鄂伦春族聚居地区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探讨异族通婚与文化接触的关系问题。此个案初步说明,就一种文化与社会环境互动引起的异族通婚而言,尽管不排除一定的文化剥夺和屈辱,但是总体上呈现文化之间互补、共生的“非零和”取向。

[关键词] 异族通婚;文化;非零和;鄂伦春族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非零和”理论,大致意思为:博弈双方最后总的博弈结局是分不出谁输谁赢的,没有明显的输赢分界,结局不是“零和”,事实上,更有可能是博弈双方彼此吸收、互补,即“非零和”。^①将此认识引用到文化接触研究中,可以就接触趋势作出新的展望,或者提示可能存在一种新的可能或尚不被科学认识的民族关系事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我们说,不同文化接触、互动以及总的走向、发展远景,更有可能呈现为文化要素之间互补、共生的“非零和”取向,或一定程度实证着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贯穿的文化之间“和谐与对话、双赢和互利”^②思想的真理性。

① 参阅[美]罗伯特·赖特著,李淑君译:《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② 见郑杭生:《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贡献的再认识》[J],《西北民族研究》,2010(2):3。

就异族通婚而言,异族通婚的双方,作为彼此对应的文化“他者”,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夫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互动,并由文化个体之间的关系,引入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异族通婚的频率和比例,离不开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底色,因此,异族通婚成为洞察民族关系和文化接触状况的有效视角,也是我们测度和判断社会和谐水平、可能性以及未来远景的重要指标。

本文在尽可能利用其他资料的基础上,主要凭借作者在鄂伦春族聚居地区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侧重异族通婚与文化接触关系的研究。此个案初步说明,在不同民族男女通婚后的家庭中,就传统文化同质性较强的狩猎文化而言,因对异文化的借鉴以及借鉴过程中的整合,增添了自身适应现代社会急剧变化的韧性;而从汉族占绝对比重的异族方来看,因与鄂伦春族通婚而借此间接享有了民族优惠政策,并且因自身农业、多种经营技术以及经营经验、市场观念等恰为鄂伦春族转产所需而大有作为。同时,在获得相对稳定的生存保障的同时,农耕文化在反思中得以调整和丰富。此个案表明,就一种文化与社会环境互动引起的异族通婚而言,尽管不排除一定的文化剥夺和屈辱,但总体上呈现为文化之间互补、共生的“非零和”取向。^①这一判断,可能会让我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进一步贴近实际。

一、异族通婚史及目前异族通婚状况

作为过程的“时代”,“是一个‘社会—时间’概念,它指的是某种社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表现出来的重大特征”。^②各个“时代”的串联,便构成国家、民族以至于个人的历史。而梳理历史,可以提升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认知。鄂伦春族与异族通婚日益成为社会现象,当从1953年定居起。狩猎文化传统婚姻形态,是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实行严格的族内氏族婚制。纵观鄂伦春族婚姻形态,异族通婚从零星发生到渐次增多,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是氏族内部禁止通婚制度的漏洞,即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不得不选择异族通婚;二是外部社会环境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后一因素,随历史时段的推移而日益成为决定因素。

关于前一点,20世纪30~40年代一份实地调查资料记载:一位调查者的帮手、达斡尔族青年海山,与鄂伦春族“乌力楞”中的一个鄂伦春年轻男人交了朋友。这个年轻男子央求海山从南方帮他找一个蒙古族妻子,因为在这个部落中女人很少,而他的配偶在一年前被一位举止洒脱的情人拐走了。^③这是说,如果所在部落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就会迫使人们到异族中寻找婚姻对象。

从17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清政府“东北封禁”的解除,鄂伦春族对外交往对象日益复杂化。鄂伦春社会最早的异族,主要是达斡尔族、满族,后来汉族很快成为主要异族。史料记载,1916年,呼玛县汉族商人谭宝善(吉林省人)、奉天人李金录为垄断鄂民猎品,“娶鄂人之女”,30年后成为巨商,在黑河建有洋楼。1921年,为了排挤同行,垄断鄂伦春族猎品收购,十八站的河北昌黎县商人杨玉亭与鄂伦春女人结婚,并请求加入鄂伦春族旗佐。^④以上资料部分反映出通婚与经济利益、实际生存的直接关系。1923年发生在呼玛地区的“刚通事件”,也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特定时期民族之间经济关系的紧张、激化,会上升为政治冲突的现象。^⑤饶有趣

① [美]罗伯特·赖特著 李淑君译.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② 王思斌.社会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OL].<http://www.cass.cn/>,2010-03-23.

③ 参阅吴文衔主编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一集[C].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153.

④ 王兆明主编.新生鄂伦春族乡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9~20.

⑤ 鄂伦春人刚通,1869年生于盘古河,正蓝旗头佐佐领。他不仅目睹了奸商与官府勾结盘剥猎民,甚至使猎民家破人亡的悲惨状况,而且其本人也深受其害,两个女儿被拐骗嫁给了两个奸商,因此,曾五次呈文库玛路协领公署和黑河道伊公署,恳请当局采取措施减轻对猎民的盘剥,但均未引起重视。1923年春,当得知奸商夏老五等人灌醉猎民,抢去鹿茸及珍贵皮张,又把十几名猎人绑在树上杀害的消息后,他怒不可遏。随后,他派出向官府控告的代表也在途中被杀害。情急之下,刚通组织猎民六十余人,先后杀死奸商三十余人,然后抢得一部分粮食、衣物逃进深山。这起发生在呼玛河流域、十八站、塔河和盘古河一带的反对奸商的武装斗争,即是鄂伦春族历史上著名的“刚通事件”。参见新生乡志编撰委员会编.新生鄂伦春族乡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406.



味的是,起义领袖刚通的妻子是汉族,起义消息是其妻泄露给经商的亲属的。

19世纪中叶,在狩猎民族鄂伦春族中出现农业,无论是鄂伦春族自发的适应,还是迫于政府行政命令的“弃猎归农”,其中一个普遍现象是,多数猎民家庭需要雇佣外族人种地,而用自己打来的猎品付给雇工工资。据资料,民国时期,在庫玛尔路雇外族长工的12户鄂伦春人中,雇工达30人。^①毕拉尔路的3户,雇工14人。^②雇佣的长短工中,主要有达斡尔人、汉族人和满族人。“经济压力,是汉人对付应该对某一地域享有权利的通古斯人的最重要武器之一。汉人很容易进入通古斯人家庭,最初是当雇工,后来作为债主和女婿,成了原来主人的养子。汉人就这样进入到北方通古斯人的本体之中。”^③异族凭借熟悉农业生产的优势,为尝试农耕的狩猎者所需要。如毕拉尔鄂伦春人从清末到“九·一八”事件,二十六年中约开垦荒地四百多垧。在松树沟,莫丁星格在两个达斡尔族女婿的帮助下,开荒十来垧,盖了两间房,没有雇工,自己种。^④

不难发现,把握上述异族通婚史,排除可能的特例,基本上证实了以下道理:第一,“民族学或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的科学,不应该回避人的最深处,不应该回避他的本能和感情生活。”^⑤因通婚氏族内部男女比例失调,在有外部条件时,就有可能选择异族通婚作为弥补,这是人的本能和感情生活需要。第二,“我们无须多加思索即可相信,在人类从最简陋到最高级的所有阶段中,经济力量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⑥人类生存的初始条件,“包括一定程度的温饱 and 栖身之所”。^⑦为了满足生存初始条件,有时经济力量成为强于感情力量的推动力量,当事者意识到与异族的通婚可以获得经济力量,或双方的文化接触往往使其成为必然。如上述无论是模仿周围汉族、达斡尔族尝试种地,还是迫于政府压力“弃猎归农”,凸现出鄂伦春族对农耕技术的需要,从而雇工,从而交往密切,从而促成异族通婚增加等等,因而使以汉族为代表的农业文化在鄂伦春社会自然赢得市场,从而渗透进婚姻领域,鄂伦春异族通婚日益成为社会现象的“历史照面”。现象和现象的原因,有一些仿佛还是旧的,这很自然。

目前,鄂伦春族与异族通婚不仅成为普遍现象,而且在鄂伦春人的观念意识中被普遍接受。据笔者2003年9月在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人口中进行的抽样问卷结果,在鄂伦春族干部职工阶层的57份样本中,关于“您认为应该对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持什么认识和态度”的问题,21份认为是“民族开放标志之一”,占36.8%;17份认为“有利于民族团结”,占29.8%;14份认为应该“顺其自然”,占24.6%。乌鲁布铁、讷尔克气村28份猎民阶层的样本中,关于“您或您的亲戚选择配偶时,可能优先考虑的是哪个因素”的问题,居于首位的选择是“经济状况”,其次是“教育程度”。关于同一问题,希日特奇、木奎村28份样本中,居于首位的选择是“经济状况”,其次为“教育程度”。在鄂伦春中学高中的25份样本中,关于“你将来择偶的条件考虑”,第一位是“学历”,占40%;第二位也是“学历”,占28%;第三位是“道德修养好”,占40%。关于同一问题,初中30份样本中居于首位的选择是“不考虑民族”,占46.7%;第二位是“学历”,占33.3%;第三位是“道德修养好”,占43.3%。

鄂伦春族主要聚居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和黑龙江省11个猎民乡镇与15个猎民村中。据2003年各个猎民乡镇、猎民村基本情况统计资料,实际生活中,各猎民乡镇的鄂伦春族与其他民族人口结婚组成家庭的情况为:在讷尔克气村47户猎民家庭中,有1户是同族通婚家庭。排除14户鳏寡孤独家庭,32户家庭是异族通婚家庭,同族通婚与异族通婚的比例为32:1。在32户异族通婚家庭中,与汉族通婚的12户,与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通婚的20户,与汉族通婚的比例占异族通婚的37.5%。在木奎猎民村15户完全家庭中,异族通婚家庭13户,鄂伦春族同族通婚家庭2户,异族方族属绝大多数为汉族。“姑爷户”即汉族男子娶

① 参阅《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六》和《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十一》,农业部分。内部印刷。

② 参阅《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三》和《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十一》,农业部分。内部印刷。

③ 参阅史禄国、赵复兴等译.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109~138.

④ 根据《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六》和《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十一》(农业部分。内部印刷)整理。

⑤ [英]马林诺斯基著,梁永佳、李少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98~99.

⑥⑦ [英]马林诺斯基著,梁永佳、李少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序:2.

鄂伦春族女子的家庭,占大多数。在诺敏猎民村 18 户家庭中,异族通婚家庭 14 户,鄂伦春族同族通婚家庭 2 户,孤儿户 2 户。异族通婚家庭,鄂伦春男子娶达斡尔族女子的占相当比例,而鄂伦春女子嫁达斡尔族男子的也比较突出。这与该村与达斡尔族聚居地比邻,历史以来接触较多有关。在朝阳猎民村 27 户家庭中,24 户是异族通婚家庭。以上四个猎民村鄂伦春人与其他民族人口结婚组成家庭所占的比例,反映出鄂伦春族人口与异族人口通婚的普遍性。另外两个猎民村——希日特奇、古里的情况与此类似。

鄂伦春族干部职工阶层与其他民族通婚也已成为普遍现象。据调查了解,在八百多名鄂伦春族干部职工中,夫妻均为鄂伦春族的家庭,粗略统计不到十户。在与中学生的交流座谈中感到,在他们对自己将来婚姻的设想中,婚姻对象族属如何已基本排除在择偶条件之外。黑龙江省鄂伦春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组成的家庭也占人口统计的绝大多数。在当地,人们习惯把汉族或其他民族的男子娶鄂伦春族妇女为妻组成的家庭叫“姑爷户”,把鄂伦春族男子娶汉族或其他民族妇女组成的家庭称为“团结户”。

关于异族通婚,一般认为,只有当两个或多个民族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达到一致或高度和谐,互相之间存在广泛的社会交往时,才有可能出现较大数量的异族通婚现象。因此,一般认为,族际通婚是民族关系融洽和谐带来的结果,唯有其他方面的民族关系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大规模的族际通婚才有可能出现。除了与以上理论相印证,笔者明显感到,鄂伦春族选择异族通婚,或异族选择他们通婚,更多的是出于实际生活利益的考虑。其中,民族区域自治,自治旗给予鄂伦春族的各项优惠政策,制度化所形成的民族社会分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婚姻主体条件与从实际生存需要考虑的婚姻

大体上,鄂伦春社会表现为三个阶层:猎民阶层、干部职工阶层及学生阶层。在猎民阶层中,概括而言,“姑爷户”给人一种感觉:女方鄂伦春妇女,似乎身体有病或残疾,不甚健康者较多,有些人容貌上似略逊色于男方。如木奎村八户异族通婚家庭,有两户女方腿有残疾。总体上,似乎男方的个人条件好于女方。

体质和体质特征是决定婚姻不可忽略的因素。人们之间在体质外观上的差异是很容易分辨、很容易造成深刻印象的。鄂伦春人体质特征虽然与蒙古人种的差异不明显,但还是相对存在的。这种差异,与我们在此主要强调的体质因素——身体健康水平、外形条件、有无残疾——相结合,当然会形成一种婚姻条件。问题是,人们在互相接触中,在态度上是否愿意接受对方,在感情上是否认同对方,在心理上与对方的距离感等等,都会受到彼此体质差异程度的影响,他们会十分自然地考虑:对方是不是“异类”?对方和自己在体质差别之外是否也会在其他方面——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有可能存在着认同?体质差异越大,上述考虑表现得越明显,带来的距离感也就越强。族群之间的体质差别越小,相互对于另一方的“异类”感也就越低。

调查中看到,在鄂伦春族与汉族等民族组成的家庭中有身体残疾、相貌一般的鄂伦春妇女与身体健康也英俊的汉族适龄男子组成的家庭,也有汉族健康的青年男子娶岁数比他大、带有几个孩子的鄂伦春族妇女组成的家庭。总之,男女体质条件不相当的婚配不在少数。那么,此处的体质因素在异族通婚中,是如何显示或被当事者淡化的?又是哪些社会因素在左右着他们的婚姻抉择?有的夫妻年龄悬殊很大,如乌鲁布铁村 J 家(男,汉族,69 岁;女,鄂伦春族,56 岁),诺敏村 T 家(男,汉族,52 岁;女,鄂伦春族,43 岁),诺敏村 W 家(男,汉族,28 岁;女,鄂伦春族,32 岁)。

而关于干部职工阶层的异族通婚家庭,在调查、接触中感到,作为鄂伦春族的女方一方,个人在受教育水平、社会身份、声望、工作能力等方面,往往优越于异族方,似乎作为鄂伦春族的男方一方,也显示出这种特点。对异族方而言,是否也是为了分享民族政策带来的好处而选择鄂伦春族干部职工为婚姻对象?更何况能够到旗里工作的鄂伦春人,个人条件——体质(包括容貌)、气质、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人已无差异,甚至好于异族人。那么,为什么条件都很好的鄂伦春干部职工阶层与同族通婚的比例不高?

因民族社会分化,猎民阶层、干部职工阶层与异族通婚的形态显示出某种差异。同时一致表明,在婚姻本



身所自然要求的体质、容貌、年龄大体过得去的情况下,鄂伦春族以汉族为主要通婚对象的异族通婚之所以成为社会现象,婚姻当事人主要是从生活实际需要和既得利益考虑的。在年轻一些的人群中,可以说双方都有这方面的考虑。对异族方而言,制度化的优惠政策,如政府为猎民免费盖房以及之后的维修、新建,陆续出台的子女助学金补助、升学、入伍、招工、提干上的特殊政策,猎民护林员津贴,医疗政策以及不固定提供的生产、生活上的扶持政策等等,都很有吸引力。随着1989年猎民生产方针调整为以农业为主和从事其他多种经营,特别是鄂伦春自治旗1996年的禁猎,政府加大农业扶持力度,给每户猎民都分配了土地,并作为禁猎补助,每人每月70元。以上种种政策优惠,极大地吸引了一些生活困窘的异族人口。通过有限调查,可以推断异族的来历、个人情况,无论男女,他们多在原居住地生活困窘者。他们一般投亲靠友而来,寻找生活出路。往往先在这里打工,后来经人牵线娶了鄂女。由于实际生活压力,经过利益权衡,一些人降低择偶条件,不在乎对方是残疾或既是寡妇,又比自己年龄大。娶鄂伦春妇女,从而解决了婚姻、家庭、生计的现实问题,甚至未来子女上学、就业问题也好办了。同时,也有可能为老家的三亲六故带来转机,如让他们来此打工、租地。另外,这里的婚姻市场竞争不甚激烈——异族男子在此娶妻省钱,鄂伦春姑娘不如老家姑娘要的彩礼多,而在地离异、生活不幸的异族妇女流落至此,嫁给鄂伦春男人,政府提供的房子、可以保证基本生活的各项补助,也可以使她们的生活安稳下来。而在鄂伦春族一方,在狩猎文化、社会环境熏陶中成长起来的鄂伦春男青年,许多不擅长农业和其他生产,如不擅长开小卖店、开豆腐房、杀猪卖肉挣钱,种菜、打鱼去市场上卖,也不习惯开汽车、搞小家电维修,而且性格、脾气可能不太圆通,一般好喝酒。凡此种种,均使鄂伦春年轻妇女择偶时容易转向异族男性,为了实际的生存,嫁能干、勤奋的汉族人,因此也就不太苛求彩礼了。

不难发现,猎民村中的猎民与外界交往并不广泛,当地没有形成城市社区那种民族混杂、共处的情况,不能提供异族之间交往、实现婚姻的客观条件,往往是经由中间人从外边“引进”婚姻对象,而在此之前,婚姻双方并不熟悉。

三、文化借鉴、支持、冲突中的婚姻与社会影响

如前所述,族际通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两个异性的关系,还有两个人所代表的族群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族际通婚代表民族之间的接触、文化之间的接触。夫妻关系、家庭生活情状,往往带给社区特有的、流动的某种氛围、风气,家庭关系往往渗透进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笔者1998年、2000年、2003年在内蒙古和黑龙江省鄂伦春族聚居乡镇的调查,集中反映了上述情形。

1. 诺敏猎民村三户异族通婚家庭的生活

Q家:Q女,43岁,鄂伦春族,再婚,与前夫生有2女,与现夫生有1子。她吸烟,身体看起来一般。她的丈夫T,52岁,青岛汉族人。1962年,他因父母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下放农村,后来流落至此。该户目前有5垧地,出租,一年收入近5000元。T主要靠替人杀猪、自己杀猪卖肉挣钱。他说,替人杀一头猪挣100元。他家有一个显眼的大冰柜,里面冷冻着猪肉,村里人都到他家里来买肉。

B家:B男,35岁,鄂伦春族;其妻,32岁,汉族,12岁时随父母来到此地。她的父亲是木匠,也当过包工头。她是再婚,与前夫生有2子。与B结婚已4年,现在有1个近周岁的女儿。现在家里6口人,夫妻、婆婆、3个孩子。B曾蹲监狱10年,是在鄂伦春中学读书时犯的罪。出狱后回老家,改邪归正,又娶妻生子。看得出,他对这个家是十分珍视的。他言语不多,很勤快地忙里忙外。他热情地为我们沏茶倒水,笑呵呵的。该户现有6垧多地,平时夫妻俩下地,忙时雇人。女主人与前夫离异的原因不便多问,她只是说,现在社会就这样了。似乎是前夫不仁义。

U家:U男,28岁,汉族,黑龙江海伦县人。他来此是投奔住在诺敏镇的姑姑。现在他大哥一家也搬到这里生活了。我们说话时,他19岁的侄子也在他家。这个小青年想在村里开小卖店。U的妻子是鄂伦春族,32岁,再婚,与前夫生有2女1子。大女儿十三四岁,小学五年级。我们看到,这个女孩身体虚胖,不太伶俐,当时她懒散地躺在外间一个小屋里。U说,孩子今天不舒服,所以没去上学。说话的中间,U的妻子进来一次,从敞

着门的破旧衣柜中找出要用的东西,很快出去了。看她很苍老,身体也不结实。U说,妻子怀孕已经两个多月。妻子的父母是退休职工,在诺敏镇住。U家有五六垧地,因只有他一个劳动力,所以需要雇工。另外,他农闲时到镇上开车拉沙子,拉一车20元,一天能拉五六趟。他在老家时开过榨油机,他现在计划开个榨油坊。U小学没毕业,但人反应很快。他对妻子比自己年龄大很清楚,但是因为娶妻没花多少钱,再加上鄂伦春族有政府给批地、盖房子、发补助等好处,再加上妻子的贤惠,所以,对眼下的家,他是满意的。

以上随机走访的三户异族通婚家庭的生活状况表明,异族通婚家庭在当前政府扶持鄂伦春猎民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并鼓励从事其他生产的经济政策环境下,显示出对土地的有效利用的优势,并因有其他劳动技术——替人杀猪、卖猪肉、开车跑运输、开榨油坊等,家庭收入增多。

2. 其他比较典型的异族通婚家庭的生活

朝阳村J家J,女,31岁,鄂伦春族。她父母早已去世,和弟弟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她姐弟3人,她排行老二。哥哥33岁,腿残疾,爱喝酒,至今未婚;弟弟19岁。她父亲是酒后手脚冻伤,打针过敏致死的。母亲喝酒,有心脏病、肺结核。她母亲姐妹3人。母亲的妹妹心脏不好,有病去世。母亲老三,30多岁时被火车撞死。

J的丈夫F,年龄与J相仿,汉族,黑龙江青岗县人。他来这里后,父母也随后迁来此地。J夫妻生有2子,大的12岁,小的10岁。J家有拖拉机1台。2000年分到15亩地,种的黄豆和饭豆。原来是租别人的地种,一垧地给800斤黄豆,他们租了七八垧地,年头若好,一年可以收入1万元。谈论中,女主人对自己家到底租了多少地不太清楚,男方知道。妻子和两个孩子每人每月享受政府禁猎补助70元。家里的彩电是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公家发的。J家的家境在这个村属于中等。从这一家生活也看出异族通婚给鄂伦春族适应农业生产、保证维持生活的帮助,这与政府优惠政策形成互补。

古里村S家S,男,鄂伦春族,46岁,猎民;女主人W,40多岁,汉族。女主人从黑龙江阿城地区嫁过来,在此已生活20多年。家有4个孩子。大姑娘考上呼盟中专,学费旗里负担。老二、老小现在阿里河镇读书。家住3间政府统一盖的土平房,有一台18英寸彩电,陈设简朴。女主人称,在老家时她种过地。现在家里出租60亩土地,年收入4000多元。“老头不愿干农活,只拉车把我送到地里,他只照顾马和车。”1998年乡里机耕队给开地,先由个人清理地面。年轻时,她曾在木器厂干过活,前些年种过蔬菜。

古里村G家G,男,汉族,39岁,再婚;G妻,鄂伦春族,33岁。G说,“团结户”占该村的80%。他是1988年从黑河伊安县过来的。来此后打猎,除用枪,也下点套子。现在种地200来亩,政府没投资,是自己搞的。现在住的4间房是自己盖的。G会做木耳菌,准备2000年冬天种木耳段。现在家有5口人:G、妻、G的父亲、2个女儿。2个女儿中有与前妻生的1个。与前妻是在猎民村离婚的,两年后娶的现妻。妻半残疾,干活不方便。家有四轮车1台,没有牲畜,明年(1999年)干不过来要雇人。准备贷点款,种1万段木耳,投资5000元。去年收入1万多元。

塔河县十八站乡W家,W,30来岁,汉族,工人;妻,20多岁,鄂伦春族,乡干部。有1子。W说,他写过关于异族通婚的文章,题目大约是“鄂伦春族骑马对鄂伦春族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说,白银那乡鄂伦春族汉族骑马每五年举行一次骑马联谊会,交流如何进行生产、经营,促进鄂伦春族发展的经验体会。已举行过两次这样的会议。全乡与鄂伦春族妇女结婚的汉族男子近50人。W的儿子的汉族名叫“关王鄂汉”,鄂伦春族名叫拜兰(最有知识的人)。上学叫什么名子,还没有最后定下来。男主人给起的汉族名是“关王鄂汉”,以全面反映民族特点。女主人不同意,因孩子降生前,妻姐已为孩子起好了鄂伦春族名子。因为孩子的父亲是家中老小,而且其兄已有男孩,按照汉族“大儿子,大孙子,奶奶的命根子”的说法,这个孩子姓父姓还是姓母姓,叫哪个民族的名子,已不重要。W认为,汉族与鄂伦春族妇女结婚,对鄂伦春族走向多种经营,更快地适应农业生产,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姑爷户”的家庭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夫妻关系也好。

白银那乡Y家,Y,女,鄂伦春族,30多岁,腿残疾,民间歌手,白银那乡干部。Y的丈夫30多岁,汉族,老家山东,现在是个个体户。有2个女儿在上小学,学习优秀。Y1995年当选为黑龙江省第八次妇代会代表。她说,本地有13名鄂伦春族女子去了山东,她也准备将来随夫去山东生活。

上述四户中S家和G家的情形,再一次证实了鄂伦春族与汉族等异民族通婚,对鄂伦春族走向多种经



营,更快地适应农业生产的带动、促进作用。同时,异族通婚也使异族人得到各个方面的生活保障和切实利益。应该说,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家庭一旦结成,婚姻双方一般是互惠互利的。Y和W的家庭生活给人某种希望,代表两种文化的个体之间融合之水平,意味着文化之间吸收、整合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外界的意料。

3. H姐在乌鲁布铁村的生活

2003年9月第三次来到乌鲁布铁村。这次乌鲁布铁镇党委副书记安排我们住到A家。当地人都知道,A的父亲是汉族,是最早来到甘河流域的汉族人。因为人老实、厚道,鄂伦春人很接纳A的父亲。A的父亲娶鄂伦春族姑娘为妻,A就成了鄂伦春族。A的妻子H,当地年轻一点的妇女都管她叫“H姐”。

H姐是吉林省榆树县人,19岁时嫁给A。她说自己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那是“文革”前后,一家人为了逃避老家不景气的日子来到这里。为了一家人能在此地安家落户,父母强迫她嫁给猎民A,从而借女儿的关系享受到国家对鄂伦春族的优惠政策,一家人得以在此落户、分地。一直到现在,她的胞弟还在租种她和A的耕地。她是老初中生,头脑敏捷,口齿伶俐,人们说她写的字很漂亮,写材料出手很快,1998年时她还是村妇女主任。她在这里生活近30年,已经完全是这里的人了。但是,每当回忆起自己的身世,特别是念的书没太用上,总有些遗憾。H姐讲的与A的日子,让人记忆深刻。

H姐曾回忆说,有一年A带500元钱领着不满10岁的女儿去大杨树镇办年货。他答应女儿的要求,下了饭馆,吃饭用去许多钱,自己也喝醉了。女儿自己去商店为自己挑了一身衣服。A喝醉后,从台阶上摔下来,磕破了头,又差点把女儿丢了。最后,他领着女儿,背着一串盖帘回来了。A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喝酒容易醉,一醉就摔东西,电话已摔坏了12个。我们到他家的第二天,他妻子去大杨树镇买菜,顺便花40元买回了新的电话。他一醉,就向妻子要由她管理的钱。给过妻子1000,则要她还回1000,不管中间是否已用过。可能是平时老是妻子管钱,而且管得很紧,所以A也烦。喝醉了酒又想起来了。

我们在他家住的两天,每天早晨都是A起来做饭。A说他高兴了才做饭。

他给我们做他最拿手的那种柳蒿芽和饭豆、猪肉炖在一起的鄂伦春族传统菜肴。H姐在饭桌上说,她特别爱吃A做的这种菜。

族际通婚牵涉着两个人所代表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是民族之间的接触,文化之间的接触。而且,族际通婚带来的文化接触与影响,还辐射到双方的家族、亲属、社交圈以及所在社区中。笔者了解到,在T猎民村Z的土地交给汉族婆婆一家经营,具体怎么经营,Z没有兴趣多问,只要收入上不吃亏就可以。也是在这个村,一年轻猎民因种地的事与汉族岳父家意见不同,发生冲突后开枪打死岳母,然后开枪自尽。在G猎民村,A的土地租给汉族内弟耕种,而同村T认为他的汉族女婿是他经营土地的“参谋长”。M猎民村有一对汉族兄弟先后娶鄂伦春妇女,W猎民村也有蒙古族兄弟先后娶鄂伦春妇女。异族通婚不仅扩大了猎民村异族人口的规模,也拓宽了文化传播、文化整合的范围。因此文化冲突和交流的范围已超出夫妻之间,而扩展至他们的亲属、社交圈和社区中。

与此相关,因异族通婚的普遍性,通过婚姻移民过来的以汉族人口为多数的异族人口,业已构成猎民村的亚社会单位。他们的话语意识显然自觉于猎民。一个现象是,在猎民村,每当进入一户人家,只要是异族通婚家庭,与笔者交流的一般总是异族方,而鄂伦春族方多数人不善言辞,在一旁坐着或借口离开。家庭的大事,似乎也由汉族方做主。而在社区层面,猎民村的异族媳妇、姑爷往往成了外交的头面人物,如T猎民村,笔者两次进村均是担任村里大小职务的异族妇女出面招呼,由她们谈论村里的是是非非。而一些外来人也也许真正想去拜访的鄂伦春人,要靠乡干部、村干部帮忙去找。一些鄂伦春老人也许脾气不太好,不那么会来事,当地干部知道这些,或许为了省去麻烦,而更愿意带外人到性格随和、更会跟人打交道的有异族人口的家庭中去。已经有鄂伦春族干部发现这种现象并表示不满:总由她们(指异族)出面接待,她们算什么?猎民村的社会话语,由异族人左右了一大半,真正猎民的生活现实、猎民的情感和意愿被隐去了许多。也许,鄂伦春人会感觉不舒服,名义上是“猎民村”,而在外来人面前,他们没有赢得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民族尊严。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那次在T村,因我们进村只找了村书记(异族),而没有再去找村长(鄂伦春族),所以后来发生了村长撕毁问卷的事。村长追问道:来的人在哪里?当时,笔者即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实际上,那

是对一个民族自尊的冒犯。

那一次在 T 猎民村,从 Y 家回到房东 A 家,听到四五个异族妇女谈论 Y 家的事情。一时间,Y 家那位可怜的汉族媳妇成为被鞭挞的对象,说她懒,不好好收拾家,让外人看见,给猎民丢脸。有人提到,某一次曾怎样指导她洗好被子。与猎民村异族的表现相对应,猎民村的猎民、鄂伦春族干部、职工对异族通婚的认识、评价也存在分歧。在评价本族与异族通婚的家庭与其家庭问题时,受指责的常是异族方,如汉族姑爷不勤劳,靠孩子、老婆的猎民补助为生,在家总是他们说了算,有的还歧视、虐待对方。一旦他们有事离开家,老婆就喝酒,自由了。尽管异族通婚已经普遍,而且问卷调查表明,鄂伦春族猎民、干部职工、学生各个阶层对异族通婚普遍认同,但实际生活与理论归纳距离很大。

四、异族通婚:痛却快乐的生命之树

无论给通婚双方带来了什么,异族通婚毕竟似乎是难以逆转的现实。回顾历史,传统婚姻制度的影响,可能已经很微弱,异族通婚是民族内部文化碎片化、社会分化与外部环境、条件巨变以及内外互动的必然产物。文化吸收、利益互补与共享,是当代异族通婚的深厚底蕴。

就鄂伦春族而言,与异族通婚,对这个小民族的现实生存发展,确实带来了积极影响和实际帮助,这应该被认为是主流。异族通婚作为当地社会敏感话题,尤其是对鄂伦春族的是非功过,人们情感复杂,尤其一些读过很多书的鄂伦春人。对此,一些研究形成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异族通婚促进了鄂伦春族人口的体质、家庭经营能力及子女教育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与发展;异族人一般会过日子、善于治家理财、会搞买卖、种地养殖样样精通,人均收入高,生活富裕。其次,族际婚家庭重视子女教育,孩子身体素质好、智商高、考上大专院校的多。再次,鄂伦春族与其他民族通婚,扩大了视野与交往范围,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网与人际关系圈,易于克服狭隘观念及自身落后习惯,有利于民族个体的锻炼与发展。研究同时特别指出:在强调族际婚好处时,不应盲目反对民族内通婚,不应把民族内通婚家庭看作不和睦、不幸福、家庭职能发挥不好的家庭。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各流域的鄂伦春族人交往搬迁频繁,居住在一个城镇乡村,族内血缘关系较远而相亲相爱的青年,成亲结对的很多。他们对贬低族内婚观点反感,非要结婚过好日子,让一些人看看。”^①笔者也听当地一些人谈到,“姑爷户”家庭关系一般不太好,可能是通婚目的不纯:与鄂伦春族结婚后,个人或亲属可得到利益,享受国家对鄂伦春族在就业、升学、生活、生产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等到结婚或共同生活时间一长,因为民族间性格、生活习惯或本来婚姻目的不纯等原因,裂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现象,在干部、职工中出现得更多。

据鄂伦春自治旗统计局 1999 年末的调查,全旗四个猎区乡镇的鄂伦春族离婚人口 11 人,男的 9 人,女的 2 人。鄂伦春族干部职工族际婚家庭,夫妻离婚比例近年有所上升。一些研究对离婚原因有较具体的分析:男方是汉族的,找鄂伦春族妇女结婚的动机,往往是借光利用,寻找保护伞,站住脚,有了工作、地位、户口,然后就离婚。他们有的嫌妻子不会过日子、不勤快、不会体贴关照丈夫,与自己文化观念不同,为人处事原则不一致。女方是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有的嫌丈夫喝酒、打人骂人、不爱劳动、工作不积极、缺乏事业心上进心、疑心重、小心眼儿、不会来事,在社会上吃不开、受歧视等。而作为夫妻另一方的鄂伦春族男女,往往嫌自己的异民族丈夫或妻子势利眼,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光知道钱财,不讲兄弟姐妹情义及义务,看不起人,不尊重“穷亲戚”,有了地位、钱财或攀上高枝就变心等等。与此比较,族内婚家庭破裂的近年时而出,但比例很小。族内婚夫妻,在相同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相互了解,恪守道德情义,相容性较强,容易化解矛盾,就是一方不会过日子,不会治家理财,或好喝酒,也不嫌弃。^②看来,由婚姻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冲突、利益纠

①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0.309~310.

② 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76.



纷、社会矛盾远没有结束。而伴随异族通婚出现的鄂女嫁异族男、族内男性婚娶难等社会问题,也早已引起社会 and 政府的关注。

尽管我们说鄂伦春族与异族通婚带给当代鄂伦春人许多伤感,但同时,现实生活也使鄂伦春人民意识到调整思路的必要,或者说生存的实际需要在指引他们应该怎样走。要文化,还是要人,人民做出了最优化选择。呈主导性的事实是,原生形态的文化——狩猎文化经由借鉴、吸收异文化优势,生长出次生形态的文化,获得了新环境下的文化适应。关于“混合家庭”的调查表明,在这种家庭生活的某些人,借助他们配偶与子女的经验,开始重新观察他们的环境,反抗以前习以为常的那些东西。^①而“知识的积累和通过发明与发现而产生的技术改进,通常被认为就是‘进步’”。^②因此,从文化接触、文化博弈角度观察,在文化借鉴、磨合、生存的互相支持中的异族通婚,表现出非零和取向。应该指出,这一取向带给我们的另一启发或许是:民族不是铁板一块,人性和人类生存的冲动,常常超出既往概念。

[收稿日期]2010-01-09

[作者简介]何 群,女,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博士。呼和浩特 010022

The Sum Non-zero Effect of Exogamy and Culture Contact: Taking Oroqen as a Case *He Qun*

Abstract: To some extent, exogamy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al individuals can introduce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culture. The frequency and proportion of exogamy is decided by the special history background and social environment. Exogamy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visual angle for us to penetrate national relation and cultural contact but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and predict the level of social harmony and the probability of future perspective. This case tentatively explained that although there is some cultural deprivation and humiliation, exogamy caused by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otally presents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um non-zero effect orientation.

Key words: exogamy; culture; sum non-zero effect; Oroqen

^{①②} 参见何群等著:《狩猎民族与发展——鄂伦春族社会调查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188~190.